

文學版圖裡的「看見台灣」

關於「台灣報導文學特展」

文／趙慶華 研究典藏組

攝影／趙慶華、覃子君

我們衷心期盼，作家擲地有聲的文字，加上力道強勁的紀實影像，能夠穿越時空的局限，引發觀眾的共鳴；在文學的版圖裡，打開「看見台灣」的視野，洞悉這個文類所獨具的社會關懷與現實批判，歷經心靈的撞擊與洗滌之後，重新思索人、文學與社會的關係。

發想與緣起

說起「報導文學」，其鮮明的新聞性格與傳播特色，在多數人心目中所勾勒的，往往是一種生硬、冷僻甚至帶著一抹悲情色彩的文類形象。然而，除了客觀冷靜的寫實本質，「報導文學」同時也含融了作者仗義執言、打抱不平的淑世熱忱，其以映照現實、反映民眾的聲音為特點，結合作家的創造力和主觀的想像力鋪排敘事，最終乃是希望藉由文字揭櫫民生百態的境遇，進而改造現實，實踐社會改革。從這個角度來看，「報導文學」實堪稱為「最有溫度」的文類；誠然，隨著被社會的遺忘與冷落，它已漸漸冷卻。

事實上，早在1937年，作家楊逵便開始大力提倡報導文學的深刻意義與重要價值，他說：「乍看之下，這種小兒科的文學好像是沒水準的文學形式，卻和社會有最密切的關係。……我們從這裡開始建構穩固的基礎，無疑是台灣新文學將會結出好果實的前提。」楊逵以「追求真實」且「讓大眾理解、喜愛」為信念，認為報導文學是台灣新文學的基礎工程，是解放寫作者技巧、內容與思想的不二法門；所謂「和社會有最密切的關係」云云，既是對讀者的提點，也是對文學界的宣言。他本人自1935年「台中、新竹烈震」後，即投入報導文學書寫，完成了多篇親至災區勘察訪視的作品；而〈談《報導文學》〉一文，更被視為奠定台灣報導文學理論架構的基石。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在楊逵之前，就沒有相關作品的誕生。在數百年的時光長河中，報導文學看似未曾在台灣文學史上繁花似錦，卻始終秉持為弱勢者發聲、為受苦者進言的精神，默默維繫一線香火於不輟，照見島嶼幽暗陰霾的角落，也激發大眾直面現實的動力。基於此一認知，國立台灣文學館於日前推出「冷眼熱心，寫盡人間事——台灣報導文學特展」，以歷時性的分期為經、作家與作品為緯，爬梳不同歷史階段的社會現實、政治語境和外氛圍，如何影響報導文學的走向，又如何引導其發展出當時代獨有的特色。

什麼是「報導文學」？

「報導文學」又可稱為「報告文學」，基本上多為作家透過翻尋歷史、田野蹲點、實際採訪、甚至輔以影像紀錄等方式所撰寫的「非虛構」文學作品。主要以事件、人物、議題的事實傳遞為根據，結合新聞寫作的嚴謹與文學審美的趣味，一方面站在客觀與真實的立場記錄並反映社會現況，同時灌注寫作者內在心境的感悟與體會，透過小說或散文等形式，主觀地進行作品風格之

創造。而談到台灣的報導文學，追根溯源，我們會發現有三條線索和脈絡，對其產生一定的影響：包括1930年代楊逵的宣導、中國左翼作家夏衍和茅盾等人以社會主義為原則的提倡、還有1970年代美國媒體界的「新新聞」（New Journalism）風潮。

台灣報導文學的分期與特色

1930年代以前：在明確的文類定義出現之前，包括清代文人郁永河以其親身體驗所寫就的來台採硫見聞《裨海紀遊》、或是刊載於19世紀末《台灣府城教會報》上的〈北港媽的新聞〉，皆因具有敘述風俗民情、考察民生疾苦等「報導」性質，而可說是現代報導文學的先聲。及至20世紀初期，由於印刷技術的普及、報刊媒體的風行，作家們經此社會風氣感染，開始有意識地寫出與社會脈動同步聲息的報導文學作品，以感性與藝術性兼具的文字為讀者打開一扇窺見現實的窗戶，讓報導文學在台灣冒出新生的枝椏。

戰後初期至1960年代：1945年二戰結束，台灣長達50年的被殖民歷史走到終點，卻旋即被捲入節節升高的反共浪潮與威權肅殺的白色恐怖氛圍，這樣的情境自然不利於具有進步傾向和改造思維的報導文學之發展，此文類因而不得不潛隱與噤聲。然而，在沉寂的冰山之下，仍有若干伏流暗自前行——作家們運用經過包裝的筆觸，以柔性的民族誌寫作手法，書寫旅遊紀行、發行綜合性新聞刊物、或採取「新式的非虛構小說」創作途徑，留下堪稱台灣戰後報導文學的前驅作品，雖然成果稍嫌貧瘠，卻適足以見證時代風雲與歷史軌跡。

1970年代：隨著國際外交局勢的危機、反對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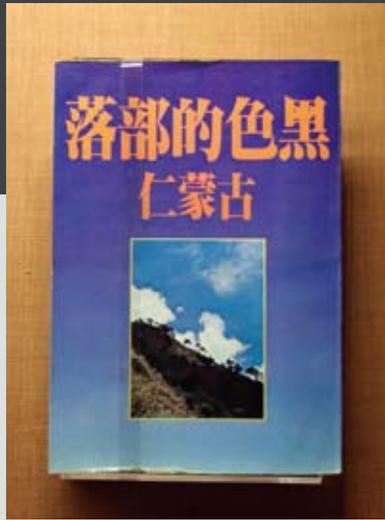


楊逵〈臺灣震災地慰問踏查記〉，刊於《社會評論》1卷4號，1935年6月。楊建捐贈。



《震瀛採訪錄》雖成書於1970年代，但書中內容皆為吳新榮於1962至1966年間以田野調查方法對台南、嘉義等地的「人、地、時、事」採訪報導所得，是以「民族誌」手法開啟台灣戰後報導文學新頁的典範。

動的開展和戰後新世代知識分子的崛起，台灣1970年代的政治、經濟、甚至文學的走向，都出現了深刻的轉變。此一趨向不僅帶動文化新生代的集結、大眾媒體的變革、社會議題的凸顯，同時也促成報導文學於戰後首次站穩腳步。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詩人、編輯人高信疆於《中國時報》推出的報導文學專



高上秦主編《現實的邊緣》（台北：時報文化，1975）。陳火泉家屬捐贈。
古蒙仁《黑色的部落》（台北：時報文化，1978）。

欄「現實的邊緣」，並舉辦「報導文學獎」，培養新秀作家寫出對台灣土地、社會議題、弱勢群體的爱，奠定此後台灣報導文學以「文化資產與環境品質的保護」和「社會陰暗面的挖掘與探討」為書寫題材的特色。

1980年代：八〇年代的報導文學一方面與社會運動結盟，同時亦隨著報紙副刊廣設專欄、雜誌媒體大量採用相關作品而展現多元面貌。陳映真及其創辦的《人間》雜誌結合攝影與文字，從事對生活的發現、記錄、省思和批評；站在弱勢者的立場，對社會、生活、生態環境、文化歷史進行調查反思與批判，發掘大量來自人民生活現場的聲音。在社會風氣劇變的年代，許多優秀的報導文學寫作者，就在此一路線引導下，延續楊遠未竟的志業，實現寫實主義文學的理想，讓台灣的報導文學走向嶄新的高峰。



高信疆（1944-2009）

有「紙上風雲第一人」之稱的高信疆，除了是資深編輯人，同時也寫詩，曾參與「龍族詩社」。1973年擔任《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為了具體實踐副刊應「捕捉社會問題，進而發揮報紙的溝通和輿論功能，介入現實之中」的理念，推出「現實的邊緣」專欄，大力提倡鄉土文化和報導文學，並積極籌畫「時報文學獎」，將報導文學列為獎項之一。其所作為，對台灣戰後報導文學的發展與推進可說發揮了關鍵性的影響力。



柏楊〈穿山甲人〉刊於《中國時報》（1982.7.12）。

1990年代以降：戒嚴體制的解除，讓台灣的社會氛圍出現了劇烈的轉折。而經過數十年的紮根與耕耘，報導文學亦於此時展現出旺盛的生命力，同時迎來豐碩的果實。許多曾經參與《人間》雜誌的作者群，紛紛於此時進入台灣社會各角落，透過在田野現場的長期蹲點、觀察與書寫，持續散布其人文關懷的理念。另一方面，越來越多文史工作與社區營造者，則藉由對歷史、土地、族群議題的梳理，致力挖掘被大歷史所掩埋的真相，並建構更多新穎且貼近台灣土地的報導議題。

回顧之後的前瞻與寄望

值此社會自由、開放與多元化的腳步日趨快速，公民意識逐漸抬頭的時刻，無疑是讓我們好好審視台灣報導文學一路走來的歷程並寄予前瞻的最佳契機；報導文學的歷史，猶如台灣社會變遷的縮影，作家們寫什麼、如何寫，其實也就反映了這座島嶼在不同階段所面臨的難題和挑戰。我們衷心期盼，作家擲地有聲的文字、加上力道強勁的紀實影像，能夠穿越時空的侷限，引發觀眾的共鳴；在文學的版圖裡，打開「看見台灣」的視野，洞悉這個文類所獨具的社會關懷與現實批判，歷經心靈的撞擊與洗滌之後，重新思索人、文學與社會的關係。✎



《人間》雜誌

1985年11月由陳映真創辦，1989年9月因財務壓力停刊，共發行47期。發刊詞以〈因為我們相信·我們希望·我們愛〉為題，自許為「以圖片和文字從事報導、發現、記錄、見證和評論的雜誌」。報導內容涵蓋文化、歷史、民俗工藝、農村、勞工、環保、族群等議題，勇於揭露社會黑暗面，深具本土意識，同時培養了大量報導文學作家與攝影人才，包括藍博洲、關曉榮、鍾喬、廖嘉展等人。其所標舉的現實主義精神、人道關懷、對邊緣弱勢和社會底層的關注，深刻影響台灣紀實攝影、報導文學的發展。